



《中国人的历史：诸神的踪迹》从神话开始寻根

上下五千年，中国文化的源头在哪里？“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这些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中的中国诸神，较之希腊神话中的众神又有何不同？

旅法学者申赋渔在其新作《中国人的历史：诸神的踪迹》中，将上古时期的历史用故事化的形式编纂，其中添加了许多作者的细节想象：伏羲“长着龙的模样，画出了流传千古的八卦图”；神农“生下来长着牛头人身，尝遍百草著成医药圣书《神农本草经》”；蚩尤“长着豹子一般的头，他的食物是砂砾、石子以及坚硬的金属”；黄帝的儿子禺犛“长着人的脸，鸟的身子，脚下踩着两条黄蛇”……生动清晰地描绘出中国神的踪迹；更通过这种追寻，找回属于中国人的审美与文化。

2012年起，作为《南京日报》驻法记者，申赋渔接触到很多海外华人。在法期间，有大学和文化机构邀请申赋渔去做文化讲座，他讲得最多的就是中国历史。许多在法华人对中国历史非常感兴趣，几乎每次都带着孩子来听。申赋渔介绍说，这些在法国出生的孩子，对中国文化了解得太少了，他们的父母心中充满焦虑。越是漂在外面，越是想找回自己的根。申赋渔决定先从中国神话入手，建立起中国人心灵的完整坐标，让读者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心灵不再漂泊。

在法国卢浮宫，申赋渔看到大量以神话人物为形象的油画，在电影院、史诗大片里也弥漫着希腊神话和北欧神话的元素。正是因为艺术品的改编，扩写，才使得这些神话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而反观中国神话，并没有在现代衍生出什么好的作品，而且数量也不多。

从上百本的古典典籍中，申赋渔一点一点寻找中国诸神的踪迹。每一本都是一个碎片，每一片碎片都指向一个最终的方向，于是，慢慢地他像拼图一样，为中国的诸神谱系理出了一个清晰的脉络，为中国的远古诸神画出了一张星图，最终完成了《诸神的踪迹》，生动清晰地描绘出中国诸神的谱系，一步步发现华夏祖先的踪迹，追寻中国文化的根源。这既是中国孩子久违了的中国神话，也是许多生活在都市中的中国人已经不太熟悉的传统生活方式和古典精神。

在《诸神的踪迹》中，申赋渔谈到了中国神话与西方神话的不同之处。“我们的神和西方的神不一样，西方的神就是神，人就是人，人不能变成神的。但在中国神话中，继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后，基本上所有的神都是由人变的，是我们的祖先中有伟大功绩的人变成的。”而这样的中国神话，体现的正是中国古老的信仰和哲学。“我们现在都讲我们是‘龙的传人’，是长得像龙一样吗？不，我们传承的就是中国人从远古流传下来的精神。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错了。中国人有五千年的信仰。而中国人一个最起码的信仰，就是从夏朝、商朝开始的：我们信仰祖先。一直到今天的清明节我们也要祭祖，这就是对祖先的信仰。”申赋渔说。

《中国人的历史：诸神的踪迹》是申赋渔计划撰写10卷“中国人的历史”系列图书中的第一卷。申赋渔说：“中国文化的基因，藏在历史当中，藏在一个个伟大的历史人物身上，藏在一个个历史事件之中。不了解历史，就不能了解自己，就不能了解中国人。”他希望这部历史书里有中国人的心灵成长史、精神成熟史、人格丰富史，建立中国人心灵的完整坐标。中国上古的神话中，包含着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密码，而这本《中国人的历史：诸神的踪迹》对此一一解读，告诉读者我们从哪里来，又将往哪里去。



《中国人的历史：诸神的踪迹》申赋渔 著 新星出版社

“玉皇大帝跟如来佛祖哪个大？”今年，复旦大学自主招生中出的一道考题，不仅难倒了考生，更在社会上引发了一轮认真的讨论。有人引据《西游记》，“从天庭排位看，如来佛在玉皇大帝之下”；有人则认为“玉皇大帝属于政界领袖，如来佛祖相当于宗教首领，分管不同领域不分大小”……

不过，这轮看似无厘头的讨论，却引出了一个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与严谨、成体系的西方神话相比，我们的神话给人的印象总是模糊、零散而暧昧的。同样是天马行空的幻想，为什么中国古人在编制神话时显得如此“不给力”？当文学、娱乐业纷纷从神话这个大IP中借灵感时，我们需要一场中国式的“神话革命”吗？

我们需要一场“神话革命”

本报记者 王昱

>> 先天不良的神话故事

其实，“玉皇大帝跟如来佛祖哪个大？”这样的问题，可能只有在中国才如此引人发笑。如果你遇到一个西方人，问他“宙斯和雅典娜哪个更大”的问题，他可能会很严谨地去翻赫西俄德的《神谱》等等古书，然后告诉你，按照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作家的“逻辑论证”，宙斯是神话中第三代神系，即奥林匹斯神系中的十二主神之首，应该神力更大一些……如果这位西方人再较真一点，他甚至可以写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考证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间地位在不同时代的变化及其背后的含义。

你也许会感到惊奇，西方人对神话这种脑洞也这么讲逻辑吗？

的确如此，毋宁说其实是我们的神话故事编得太粗糙了。

然而，这样的问题在中国是深究不得的。与严谨、富于逻辑的西方神话相比，中国古代神话故事给读者一种突出印象——用时髦的话说——“用户体验太差”：

我们在上古时代就没有《神谱》那样专门的、权威的、成体系的神话整理著述，所谓的神话散见于各种笔记、诗文、散文、个人著述等等的片段，包括《诗经》《楚辞》《山海经》《左传》等等，因此众说纷纭，版本复杂，并且互相矛

盾。对于“三皇五帝是谁”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可以轻易举出十几种版本。有些书（比如《史记》）甚至前后矛盾，让人不禁怀疑太史公写这段时是否认真。

除了混乱，故事干瘪、乏味也是中国神话的一大特色，在我们神话记叙中，神明的事迹虽多，却少有体现其人性的故事。与西方神话，尤其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神明个个有性格相比，中国神明似乎是高度脸谱化、甚至“千神一面”的——与宙斯和阿波罗的迥然相异不同，不看香案前的排位，你很难分清玉皇大帝和玄武真君有啥区别。

中国神话体系的混乱和孱弱，其实早在民国时代就被研究者们发现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说得很清楚：“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者，说者谓有二故：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能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持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

换言之，黄河流域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的先民们必须十分辛苦地工作才能填饱肚子，因此没工夫想那些有的没的，而

由此诞生的儒家文化，又强调“敬鬼神而远之”，进一步掐灭了原本就不旺的神话火苗。

与鲁迅同时代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则用现代历史学的手法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再思考。他所开创的古史辨派学者们通过考证发现，中国神话体系不仅散碎，而且相当年轻，直到战国末期才确立了“五帝”的概念，“三皇”的说法则是直到汉代才开始流行起来的。女娲造人的故事明显是中原民族在与西南少数民族接触后才借鉴他们故事灵感创造的。而真正将三皇五帝定型并且连用的，是西晋时代的皇甫谧。也就是说，直到公元三世纪，我们才形成了自己可值得一说的神话体系，这比包括古希腊在内的其他古文明至少晚了1000年，甚至晚于轴心时代的基督教神话体系。而今天人们更熟悉的玉皇大帝、如来佛祖这些神祇，则属于直到明代中晚期才定型的中世纪“仙话”和“佛话”系统，与上古的“神话”更加相去甚远。

散碎、形成晚、不被重视，这些就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神话体系的底色。当西方历史学家骄傲地宣称：“希腊神话不仅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还是它的土壤”时，我们得承认我们艺术的武库和土壤，好像有点先天不足。

>> “新神话”不能再“编着玩”

正如有些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奇幻作品眼下的窘境，的确与中国神话体系的先天发育不良有关，无论额尔金还是JK·罗琳，都曾从欧洲古代神话中汲取灵感。北欧或凯尔特神系那些严谨的神明谱系和丰富的奇幻元素，为他们的小说提供可以顺手拿来的骨架和血肉。与之相比，中国的奇幻小说想构建一个基础世界观，却需要从中国神话原本混乱、缺乏血肉的世界观中进行重新汲取和加工——三皇五帝到底是谁？女娲和伏羲到底啥关系？这些古代作者们可以模棱两可的问题，放到现代都需要奇幻作者们花心思去编写清楚。这相当考验作者的功力，所以中国想要诞生额尔金那样的“奇幻大师”注定要比西方难得多。

然而，中国奇幻作品一个更为糟糕的现状，是我们对待这些“新神话”的态度不够严谨，大量的奇幻小说、电影随意变更自己所设定的世界观，使得故事看上去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与之相比，西方的作者们为了使自己的奇幻世界看上去更加可信，甚至不惜花精力为故事中的种族设计语言。两相对照，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今的中国奇幻文学依然承袭了古人对“三皇五帝神圣事”那种“编着玩”的态度，这与习惯于认真探讨“针尖上能站稳三个天



《洛神赋》局部

使”的西式奇幻思维有着天壤之别。这种态度如不加变更，也许我们永远无法追上西方同行的脚步。

往者不谏，来者可追。我们祖先的神话不如西方人严谨、成体系，咱们这代不能再落后了——所幸，像“玉皇大帝跟如来佛祖哪个大”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已经不再单纯是句玩笑，而成为严肃的考题。这似乎预示着中国人的“神话革命”，已经快要来临了。